

关于伯恩斯坦主义 的一些历史情况

熊 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D143

50

关于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些历史情况

熊 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修正主義的根源，對於修正主義頭目伯恩斯坦的反動本質，着重地作了分析和批判；最後總結了修正主義的歷史教訓，說明了修正主義對於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危害性。

關於伯恩斯坦主義的一些歷史情況

熊 偉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5/8 字數 11,000

1953年6月第1版

195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號：2074·98

定 價：(6) 0.07 元

封面設計：趙 晴

巴黎公社失敗以後，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移至德國。1871年最堅決地代表德國工人階級利益的爱森拿赫派在德國國會選舉中獲得三萬八千票。到1874年的國會選舉時，爱森拿赫派所獲選票已增加到十七萬一千票，此外拉薩爾派還得了十八萬票。這時比普列漢諾夫建立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1883）還早十年。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如美國的社會主義工黨（1877），法國蓋德和拉法格創立的工黨（1879），意大利工黨（1882），英國的社會民主同盟（1883），比利時工黨（1885），挪威工黨（1887），奧地利社會民主黨（1888），瑞士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1889）都還沒有產生。所以恩格斯說“1869至1874年德國歷史中塞當等地戰役比起德國無產階級的發展其意義將小得多”^①。

1875年爱森拿赫派和拉薩爾派合併成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後，這個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力量也迅速增漲。1876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已擁有三萬八千黨員，出版了二十三種黨報。1877年的國會選舉，這個黨獲得五十萬票。柏林城的選民40%都投了這個黨的票。俾斯麥不得不在1878年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迫使國會通過一個“反對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治安

^①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626頁。

法”来镇压这个党。但是在反革命疯狂进攻的年代里，党领导了在非法状态下的阶级斗争；创立了地下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从国外秘密运入国内指导斗争，销行达一万二千份；积累许多利用合法组织进行斗争以及与机会主义派别斗争的经验。俾斯麦在八十年代陆续颁行各种社会保险法令，使德国成为第一个实行社会立法的国家，这并不是说明俾斯麦的仁慈，而是说明德国工人运动的壮大以及它对统治阶级所施的压力迫使“第二帝国”的魔王实行狡猾的“糖果和鞭子政策”。在反革命进攻的年代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1881年仍得到三十一万二千票，1884年达到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1890年，在“反对社会主义者法”之下经过十二年的恐怖迫害之后，竟超过一百万票达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而且选出三十五名议员进入国会，成为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终于使资产阶级认为这位铁血宰相在镇压他们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工人阶级——的职责上懦弱无能，就在这一年把他撵下台了。

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后一期登出的“与读者告别书”中写道：“‘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之后，胜利的是党。反对社会主义者法破产了，俾斯麦垮台了。强横的德意志帝国动用它的一切权力手段来对付我们，党都一笑置之，终于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它的旗帜。”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890年就打倒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德国史论集”，第二卷，第1129页。

俾斯麦这样凶狠的敌人，事实上是第二国际中以及当时全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强大最有威望最有組織的政党，而且在許多方面成为以后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榜样，那末，为什么在三分之一人类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今天，这个党还匍行在西德阿登納的脚下呢？

二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工人階級政党中出現了修正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現修正主义的原因主要在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发展。修正主义的經濟基础就是壟断資本主义。

1. 由于自由竞争的資本主义向壟断資本主义发展，巨額利潤容許資產階級有意識地运用經濟手段去瓦解革命的工人运动。他們用高額薪金和其他优惠待遇去影响一部分有势力的工人轉向他們，在工人階級內部豢养一批特权阶层，即所謂工人貴族。工人貴族由于本身生活处境的关系，竟至相信資產階級会漸漸滿足工人階級的要求。他們漸漸脱离革命的階級斗争，并把与資產階級調和的理論灌輸到工人队伍中去。

2. 在資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大量的小資產階級、手工业者和农民都破产而进入无产階級的行列。然而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並沒有廢除生产資料私有制的要求，他們只是想恢复原先的經濟地位。因此他們認為达到他們的目的的道路不是革命，而是由立法途徑进行改革。他們愿和資產階級妥协，以求改善自己的經濟状况。

3. 在資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工人运动中的党組織、工会組織以及其他群众組織如合作社等都迅速壮大，这就需要聘用大量支領薪金的专职干部。这些人的物质生活和他們所在的机构的收入以及階級和平都息息相关。任何罢工斗争以至一切革命运动都是他們的物质生活的威胁。因此他們常常愿望与旧社会相安无事。

因此，修正主义的出現其实并不仅是德国的現象，而是国际的現象。但是在德国出現修正主义，除了上述一般原因之外，特別突出地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当时选举中的巨大胜利以及其他成就，使它过高估計了議會斗争方式的作用。反对社会主义者法于1890年廢除后，社会民主党的势力不断增漲。它在国会选举中1893年获得一百七十八万七千票，有四十四名議員被选入国会；1898年获得二百十万票，有五十六名議員被选入国会。除此以外，在党影响下的职工会在1878年只有會員五万人，1891年增为二十七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1896年增为三十二万九千人，1900年增为六十八万零四百二十七人。这些胜利助长了党内机会主义的幻想，甚至倍倍尔也曾在第二国际1896年倫敦大会上提出“多几次选举！越多越好！”的口号，忽視了革命地推翻資本主义的問題。

德国修正主义的头目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是受过資产階級教育的知識分子，从1866到1878年在銀行界工作。1872年加入爱森拿赫派。1875年爱森拿赫派与拉薩尔派合并之前他写信給倍倍尔說：“我不知道你对合并作何想法，可是我相信我倆至少都同意合并的观念必須尽量坚持下去。可惜这些人就是頑固的拉薩尔派，所以我們在合并問題

上不得不妥协。”①伯恩斯坦曾是杜林的热烈拥护者②。1878年他辞去銀行职务改任惠赫白尔格的私人秘書。惠赫白尔格也是爱森拿赫派党员，是法兰克福一个銀行家的儿子，有錢，对党的許多活动，包括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內，出过多次錢。这一年反对社会主义者法頒布后，两人和施拉姆一起离柏林赴瑞士苏里支。这就是后来的所謂“苏里支三人团”。施拉姆是一个保險公司的督察，也是党员。三个人出身类似，加入工人阶级队伍都沒有阶级基础，全是从書本上开始接受馬克思主义。但是三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党倚畀正殷，要他們充当即将在苏里支創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力。他們却主張“无为”，認為反对社会主义者法乃是“頒行此法以前时期我們不大乖的行動自己討来的一条鞭子”。三人都拒絕为党效劳，却由惠赫白尔格出資办了一个“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年刊”，于1879年7月出版，其中登載了三人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顧，批判的箴言”。文章中說反对社会主义者法迫使党有一段很必需的宁静时刻来进行一番自我反省，党很需要这样一段忏悔时刻。文章又批評党对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知識分子的关門态度，責备党因此得罪了能干的同盟者因而妨碍了爭取有知識和智慧的人們的工作。他們認為党报只对工人說話，只为工人写作，对于培养优美情趣毫无貢獻。文章还批評党员們的外貌和衣着不雅，“在作工的时候衣服肮脏，自然不是什么丑事，但是在下了工以后还安然穿着肮脏衣

① 倍倍尔：“我的生平”，第二卷，第276頁。

② 同上書，第337頁。

服，这就可耻了。”文章还認為俾斯麦对虽无社会民主主义的但却显然有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华格納和罗塔·布赫尔的态度是“社会主义思想深入有教养阶层”和“新的真理无可抗拒地抓住了这些心灵”之証。^①恩格斯曾指出“这班党内文人不惜任何代价想用温柔馴順卑躬討好的办法去乞求取消反对社会主义者法”^②。

在苏里支期間，伯恩斯坦受莫特勒、富尔馬、考茨基(此时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影响，思想逐渐明朗坚决起来。1880年倍倍尔約伯恩斯坦同赴倫敦晤馬克思、恩格斯，作一次“卡諾薩之行”，即悔过之行。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和伯恩斯坦有較长时期的晤談并且影响了他。伯恩斯坦逐渐脱离惠赫白尔格及其思想，終於获得馬克思、恩格斯的信任。1881年伯恩斯坦从倫敦回苏里支接替富尔馬主編“社会民主党人”。从此时起直到1895年恩格斯死是伯恩斯坦成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在这期間，恩格斯也把伯恩斯坦列为“我們的最好的人”之一(見“德国史論集”，第二卷，1121—1122頁)。

知識分子的資产階級思想意識并不那么容易根除。恩格斯死后，伯恩斯坦的潜伏了十五年的机会主义思想又冒出来了。他于1897年在党报“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期上发表三篇总名“社会主义問題”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环节和思想环节”的論文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辯証法展开攻击。他自称他的看法是受孔拉德·施密特的一篇

① 均見倍倍尔：“我的生平”，第三卷，第57—58頁。

② 見恩格斯1882年6月20日致左尔格信。

完全以新康德派的精神來討論唯物史觀的論文的“启发”而形成的，他認為新康德派的“回到康德”的口號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理論。他提到他的觀點也源出於喬治·索列爾。大家知道索列爾是實用主義的信徒，是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格森的門徒，又是假革命的工團主義理論的開山人，而工團主義理論以後又成為法西斯主義主要來源之一。此外他還提到他的觀點也源出於克羅齊和馬薩里克。（見梅林：“哲學史論集”，塔爾海瑪序及附錄，11頁，409頁）由此可見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實質就是要把唯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系統地侵入工人運動的企圖。不難看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的出現，固然主要是在客觀方面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中有其根源，但在主觀方面伯恩斯坦的整個發展過程顯然沒有根本解決立場問題。“我們認為必須首先解決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否則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必然“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而反對無產階級，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三

康德的倫理學說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提出的道德理想，包括他承認是唯一合理的共和國國家形式在內，都是“永遠不能實現而又是我們應該永遠力求和企圖實現的”^①，都是“彼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84—185頁。

岸性”的。新康德主义是反映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系。皈依新康德主义的伯恩斯坦也“回到康德”，捏造所谓“伦理的社会主义”，承认社会主义是理想，但却是彼岸性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大家熟知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口号就源出于此。他在1898年1月19日的“新时代”上写道：“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名目下所理解的一切，我都觉得毫无意思和兴趣。无论这种目的意味着什么，我都认为是虚无，运动就是一切，而所谓运动我认为就是社会的一般运动，也就是社会进步的运动，也就是促进这种进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活动和组织。”伯恩斯坦认为只消搞一些政治经济的活动和组织就够了，用不着谈什么社会主义的目的。更进一步，他认为凭这些活动和组织就能够使社会制度适应发展需要，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不要了。他说：“现代社会所有的自由派典章制度和封建主义的不同恰恰在于，这些典章制度有伸缩性，有转变和发展能力。用不着打毁这些典章制度，只消把这些典章制度向前发展就行了。为发展这些典章制度，需要有组织，需要有强有力的活动，却不需要有革命的专政。”①“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伯恩斯坦在这一点上最深刻地表现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以他在他的修正主义基本著作“社会主义的先决

① 见乌布利希：“德国工人运动史论集”，第一卷，第205页。

条件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对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論点展开攻击，主張不从革命的而从进化的道路长入社会主义，实无足奇。

罗莎·卢森堡曾說伯恩斯坦的理論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錯誤思想，而是一个錯誤地把自己認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資产階級民主人物的思想。問題就在这里。凡是資产階級民主人物要談馬克思主义，要搞社会主义，无有不自相矛盾，扑朔迷离，甚至鬼鬼祟祟的。伯恩斯坦在他那本著作里既攻击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論点，又把他的反馬克思主义見解說成是策略問題，并且制造原則和策略之間有区别的說法来自行掩飾。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大会上多数代表反对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資产階級政府的态度，伯恩斯坦派和法国的若列斯派却极力为米勒兰的行动辯护，甚至考茨基也提出所謂“橡皮”決議承認社会主义者参加資产階級政府不是原則問題而是策略問題。在德国可以和伯恩斯坦相提并論的修正主义者富尔馬也表現了他們的“橡皮”特色，他再三強調他“从来不讓目的消失于視綫之外”，可是他实际要求的却永远是“漸漸的社会化”。在德国和伯恩斯坦齐名的另一个修正主义者阿威尔在巴黎大会上討論米勒兰事件时发言：“类似米勒兰的事件，在我国尚未发生。然而我希望，我們不久也将成长到这一地步。”可是他又曾經写过一封信給伯恩斯坦作策略指示：“爱德，你是一只蠢猪。这些事情不要講出来呀，这些事情我們做就完了。”

这些人是不是糊涂，所以才自相矛盾，扑朔迷离，以至鬼鬼祟祟呢？当然不是。罗莎·卢森堡在1899年10月德国社

会民主党在汉諾伐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演說：“倍倍尔已經正确而又痛快地指出，伯恩斯坦的意見是这样的模糊不清和含意复杂，以至于任何人都不能把他的意見装到一个确定的框子里去而又能使他不会說：你們把我的意思誤会了。从前伯恩斯坦的写作并不是这样。这样的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和他这个人无关，而是和他現在的方向，和他現在的言論的內容有关。”^① 由此可见卢森堡已經看出这些人并不是糊涂，而是他們的的方向的內容別有用心。列宁也曾指出“这种知識分子的不坚定性所給予工人階級的那些教訓，才是不应忘記的”。^② 可惜卢森堡恰恰沒有充分吸取她自己揭破的上述秘密中所包藏的教訓。

不可否認，卢森堡从汉諾伐大会时起就和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內西、梅林、蔡特金、皮克等一起始終領導着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修正主义派进行斗争，卢森堡个人还是党的理論方面的領袖。可是他們在历次的斗争中都沒有和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1899年的汉諾伐大会虽然決議：“資產階級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并不能令党認為有任何理由要取消或改变党对資產階級社会的基本观点”（1899年党代表大会記錄），可是並沒有从原則上把理論澄清工作进行到底，更沒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1901年在律貝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右派已經形成，而且已有自己的行动綱領，分明出現了党的分裂的

① “卢森堡言論选集”，第二卷，第85頁。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頁。

征象，可是倍倍尔提出的決議草案也只警告伯恩斯坦要放弃他的两面态度，并没有在組織上与他分手。1903年在德累斯登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最尖銳地批判了修正主义分子，并且決議：“修正主义派企图改变我党久經考驗且一向奏凱的以階級斗争为基础的策略，代表大会最严厉地譴責此种企图”（在德累斯登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討論記錄）。可是党的领导者無論如何要保持党的統一，所以除这个严厉的譴責而外一无所为。实际上修正主义派在党和职工会中的影响反而大增。正在这时，列宁在真正奠定俄国工人階級政党規模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坚决地向馬尔托夫派展开斗争。列宁的领导从一开始就是使布尔什維克严陣以待，与孟什維克毫不妥协。可是“卢森堡，即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的首領”，却“表示反对布尔什維克，而且責备布尔什維克有过分集中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趨勢”。^①此后德国党和俄国党的发展判若两途，在此已見端倪。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德国工人不仅以募捐等行动支援俄国工人，而且自己也举行了四十万人的大罢工，为爭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卢森堡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都主張采取“俄罗斯的方法”展开斗争。这一年在耶拿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也以二百八十七票对十四票通过了承認群众罢工是工人階級政治斗争手段的決議。可是此时职工会的领导已經基本上掌握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手里，职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列根宣称群众罢工是外国的办法，不应采用；他也反对把在外国大家都喜用的宣傳手段移用于德国工人阶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73 頁。

級运动中。在这样的领导下，这一年在科倫召开的全德职工会代表大会竟通过了否認群众罢工是政治斗争手段的決議。卢森堡在理論上領導着党，可是她在工人运动自发性問題上，在工农联盟問題上，在資本积累問題上，在帝国主义崩潰問題上，在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內胜利問題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結果她在許多問題上进行了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活动，而在对待伯恩斯坦派的問題上却把党的統一当做偶像来崇拜，害怕作出在組織上和他們分裂的决定。1906年在曼海姆召开党代表大会以前，俄国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失敗已經吓得倍倍尔向列根派讓步，在一个秘密會議上他已經答允放弃总罢工的办法。曼海姆大会的決議規定实行群众罢工須先征得职工会的同意，可是职工会却在一年前已經否決群众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了。此外在決議中还承認职工会和党有“同等重要性”，实际上就意味着党放弃对职工会的領導。因此，曼海姆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史上鮮明的轉折点。从此时起，党已无力領導革命的工人階級在二十世紀初期尖銳局勢中的斗争了。1907年在埃森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以后成为十一月革命中的劊子手的諾斯克已經公开提議：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受到战争威胁时要实行保卫祖国的原則。1913年，連卢森堡本人和梅林都被撤除“莱比錫人民报”編輯职务。这一年倍倍尔死后，党的領導就完全落入謝德曼、艾伯特、諾斯克等人手中。

修正主义的出現是国际的現象，第二国际里修正主义的出現也自有其国际的基础。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中最大、历史最长、威望最高的党，因而党内修正主义的发展也

对第二国际起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卢森堡、倍倍尔等也不断支持过列宁的坚决斗争，但是他们在第二国际中起的作用基本上和在党内起的作用相似。终于他们也未能见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首先背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国际团结而成为在第二国际中带头向帝国主义及其非正义战争效忠的党。

1918年十一月革命中，柏林工人和士兵按照俄国工人十月革命的榜样把德意志帝国皇权推翻了，但是工人士兵的前列并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却忙着接替巴登亲王的总理职位，为旧国家机器作续命汤。紧跟着他们就运用手中掌握的党组织力量，促使工人士兵代表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决议取消工人士兵代表会制度而恢复臭名远扬的国民议会制度。在这个斗争过程中，诺斯克纠集反动部队使用重武器来镇压了工人和士兵的反抗，并且还疯狂万分地自诩为一只嗜血狗。因此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代议士选举艾伯特做总统，谢德曼为总理，诺斯克为国防部长，以示嘉勉。列宁曾指出，这是用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国会制度把根本没有垮台的德国垄断资本政权很巧妙地掩盖起来。^①

卢森堡和左派社会民主党领导者们躊躇犹豫，纵容修正主义者二十年之久，终于亲眼看到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被他们盗卖断送，一切幻想破灭干净，然后才在1919年1月1日建

^① 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8,409—412页。

立德国共产党。而卢森堡在“我們的綱領和政治局勢”的报告中，号召新成立的党要在自己的路綫和以往把社会民主党引入机会主义泥沼中的路綫之間画上一条鮮明的界綫，这时候，他們所一向縱容的人們却不縱容他們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被这些反动派以卑鄙无耻穷凶极恶的手段杀害了。

血淋淋的教訓教育了德国无产阶级，也教育了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工人阶级都不得不另建布尔什維克式战斗的革命的工人党和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在各国繼續存在，但是主要起着分裂工人运动的作用。

1956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召开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在改变德国政策的关头”的口号下举行的。这个代表大会表面上猛烈攻击阿登納，可是沒有片言只字攻击阿登納所属的壟断巨头和容克地主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事实上西柏林市議會是社会民主党占多数，而推行的却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策。这个代表大会反对建立五十万人的军队，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可是它又批准了社会民主党西德联邦議會党团同意改变根本法并帮助制訂兵役法的行动。这个代表大会拒絕发动工人运动来作反对軍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它仍然坚持只作純粹的議會斗争。为什么这样自相矛盾，扑朔迷离，甚至鬼鬼祟祟呢？当慕尼黑代表大会明白宣告反对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政党与組織作任何接触任何諒解时，它自己就对这个問題作了解答。慕尼黑大会要首先通过“自由选举”恢复德国的統一，然后才来爭取德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这就表明它不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經成为现实